

馮玉祥與西北軍(六)

王禹廷

西北軍事史話之八

黃郭對吳佩孚失望

黃郭和馮玉祥聯手發動「首都革命」的情形，前面已經概略的敘述過。茲再就筆者訪問當年目擊經過的在台耆彥以及參閱有關資料加以印證，把黃郭與北京政局發生關係和演變的經緯曲折，以及相關各方的形形色色，加以引述，使中外讀者對於其中的來龍去脈，增加進一步的瞭解。

黃郭早就聽說馮玉祥治軍嚴明，私生活很整飭，與士兵同甘苦，叫得出每一士兵的名字。在天津時，又從他的好友張紹曾處，得知馮刻苦求學，辛亥革命時，在灤州有過革命活動。馮的這種經歷和風格，頗引起黃的好感與興趣。他認為像這樣的一個北方軍人，應該值得爭取，把他拉到革命陣營裏來。可惜當時不在一處，無緣結識。黃郭所著兩本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書出版，馮看後大為欣賞，買了幾百本，分發給部下讀，其中有人後來遇見黃郭，還背得出幾段警句。馮

玉祥從第十六混成旅、第十一師、督陝、督豫，聲譽鵲起的時期，黃郭正在歐洲旅行。

當直奉第一次戰爭方告結束，直系聲勢正隆。曹錕任直魯豫巡閱使，駐在保定，操持北京政局。吳佩孚是直魯豫巡閱副使，駐在洛陽，氣餒甚高，權威頗重。曹錕雖是不讀書的武人，但他性情渾厚寬容，頗得部衆的愛戴。他當第三師師長時，某次戰敗，部隊業已盡退，曹獨倚牆死守不退，被左右促之始走。曹渾厚，吳嚴峻，兩人剛柔相濟，相得益彰，因之成為大氣候。一旦析離，便告失敗。曹能籠絡各種類型的人，而吳則否。當吳氣餒冲天，國人側目的時候，曹對之始終信任不衰。吳却不能容人，逼的部將離心離德。所以當時有人說：「曹仲珊（錕）能用吳子玉（吳佩孚號子玉），吳子玉不能用吳子玉。」

二次直奉戰爭之前，吳佩孚和張紹曾，主張在廬山召集國會是會議，謀求南北的統一。張與黃郭是好朋友，曾寫信給在美國遊歷的黃郭說：「

廬山國是會議的提議，雖尚未見諸實行，已有披靡一世之概。中國統一之期，當不在遠。深望大駕早回，共圖中國之新建設。」歷來兩系相爭，未得手的一方，常不惜遷就過去或未來的政敵，北方相爭時聯南方，南方相爭時也聯北方。如果說當時無人有為善，也不見得。無奈武人的囂張，政客的撥弄，構煽變幻，國無寧日。

曹錕急於做總統，不擇手段，以吳佩孚得其信任之專，而無可奈何，不能勸阻，終於造成擁護賄選之勢，以聲罪討伐而窮兵不已，他把「百世功名」，付於流水，實堪嘆息。

黃郭立願在北方完成辛亥未竟之功，這是大有異於一般革命黨人的，也為一般革命黨人所不諒。因為他在北方多年來的超然表現，社會上不以他為異己，當局看他作書生，對於他的蓄謀進行，自然有利，他更可加緊努力了。此時北洋軍閥雖已分裂，但是他們佔據的地盤廣大，根深蒂

固，對國家為禍不為福，要想把它們剷除，必須謀求妥當的辦法。在北方的幾個大派系中，皖系與日本有深切關係，曾經貽害國家。奉系則入關爭霸，忽視後顧之外敵，皆與黃郭的主張根本難容。直系雖頗預，而無國際背景，於是他便把願望寄託在直系身上，而與吳佩孚有所接觸。吳黃二人相識，係由張紹曾而起，吳張結兒女親家，吳派程運鵬請黃當大賓，先送蘭譜，結為兄弟。

黃郭曾到洛陽看吳佩孚，吳邀與共飯，以後同往郊外試砲。黃聽了吳的言論，頗感失望。吳說：「科學吾國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關西去，格致之學被他帶走

。」（此後十年，吳在北平還對黃說：「堯關四門，就是國會，共工驩兜，就是共產黨。」）試砲時，吳自稱其目測的準確，遠遠指到一點，說是若干公尺，一經實測果然不錯，他的左右皆嘆服。其實這不是一個大軍統帥所應擅長，而且也不合科學技術的要求。吳佩孚這種自炫自大的態度，多烘的頭腦和落伍的思想，與時代距離太遠了，如何能担当國家的重任。於是黃郭對吳佩孚大為失望。

黃膺白爭取馮玉祥

黃郭（膺白）對吳佩孚既失望，便把目標全部擺在馮玉祥的身上。因為黃知馮軍中除了有美國人傳播基督教以外，別無其他國際關係。馮對黃景慕已久，便請他到軍中講課，因此雙方交往就漸漸的密切了。

北京到南苑汽車一小時可達，馮請黃到軍中作定時演講，每兩星期一次，每次兩小時，馮自己與全軍營長以上官長同堂聽講。黃郭這時在北京很忙，他在內閣有職務，又在北大、師大兼課。但從不耽誤南苑之行。往南苑的路極不平，黃的車子很舊，兩小時往返路程，兩小時講話，他宿有胃病，顛簸而歸，常捧着肚子叫痛，許久說不出話來，黃太太幾次勸他請假，他說：「馮玉

祥可能為北方工作的惟一同志，彼此必須認識瞭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叫他們能多認識本國及世界局勢，或者少誤國家事。」黃郭無論如何忙與累，南苑之行從不懈怠。一次，馮玉祥說到李漢老如何如何，黃問其人是誰？馮笑笑說：「您在內閣不識此人？」蓋曹錕的嬖人李彥青別號漢卿，官雖不大，權傾一時，北京的要人無不與他結交，而戲尊稱為漢老。黃郭從馮玉祥的言談中，知道馮玉祥對曹錕與吳佩孚之間的矛盾和不滿。馮玉祥請黃郭檢閱他的軍隊，黎明騎馬越阜躍溝，同看操練和演習。黃郭最後在馮軍講演完畢，請馮開一名單，定期，邀請其聽眾馮的部屬到家中吃頓便飯。那日請的是晚飯，但客人很早便從南苑到來，傳述馮玉祥關照的話：「黃先生不是空閒着的人，他為愛國肯來指導我們，北京城裏的人誰還像他那樣，你們早點去，謝謝他。」

民國十三年十月，直奉第二次戰爭開始。馮黃商定拉攏胡景翼和孫岳，發動首都革命。當時直軍分三路迎敵：吳佩孚自任討逆軍總司令，彭壽莘是第一路，向山海關。王懷慶任第二路出喜峯口向熱河。馮玉祥任第三路，出古北口向熱河。此時顏惠慶內閣新成立，邀黃郭繼續擔任教育部總長，黃因已與馮有約，自知不久將與直系為敵，不願留此痕跡，所以堅辭不就。直系的人因為他在教育總長任內，調解部校罷工罷學的風潮有功，目下前方有戰爭，後方更為吃緊，必須力求安定，因而一再勸他。曹錕請他到總統府，當面對他說：「這是苦差使，知道委屈了你，仍請



任甘肅督辦時的馮玉祥。

勉爲其難。」以馮與黃有交情，挽馮再勸，黃遂答應下來，其理由是在內閣消息靈通，通電通訊亦較方便。

馮出發赴前線，留「成密」電碼本一冊給黃郭，約曰：「此去前線，一路荒僻，諸事隔膜，請您隨時打招呼，一切惟您之招呼是聽。」黃問：「在京誰參與秘密？可以相商。」馮答無人。

黃又問：「何不告之子良？」（按，子良係薛篤弼的別號，時任內務部次長，代理部務，是馮玉祥的親信。）馮說：「子良胆小，且留京代我請餉請械，他若預知此舉氣將不壯，反爲不安。」

前方第三路總司令與後方教育總長通電頻繁，幸未被人懷疑，這是若干年來，黃郭言論態度比較超然，從未與某派某系有所接納，或爲一派一系獻過私策說過私話的原因。他雖然是南方人，但不存南北之見，北方人喜歡黃郭的正直，稱爲少有的南方「蠻子」。他們的來往電報，除了例行報告之外，偶然也有一、二機鋒暗示。十月中旬，馮派劉子雲由前方來北京，劉已知此番機密，看京津情形以爲事不宜遲，而馮尙持重不決，要求黃寫一封親筆信帶歸，以堅馮之心而速其決計。

黃即寫信交劉帶去，果然發生了最後效力，馮接函後電黃，暗示準備就緒。十月十八日，黃致電馮：「吾儕立志救國，端在此時。」馮立復電：「來電通示同人，衆意愈同，準十九日晚起程。」行動既定，預計若無挫折，十月廿三日國民軍前鋒可入北京城。黃郭約定先一日到密雲縣高麗營與之會晤。

黃郭·馮玉祥·段祺瑞

民國十三年十月廿二日上午，黃郭照常到教育部辦公，并出席內閣會議。回家午飯後，換穿服裝，雇車出城，半夜始到高麗營。一望無際的露天大營，幸有相識的衛兵，陪引到其中一個帳篷，馮玉祥已先在。黃郭已十小時以上未進飲食。馮玉祥出示預擬的文告通電：將內戰罪名加在吳佩孚一人身上，對曹錕仍稱總統。黃看後表示異議，他說：「國民軍如果祇是爲清君側，未免小題大作了。」馮以爲然，臨時請黃郭另行擬稿。帳篷中沒有棹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門借座，傳誦一時改變歷史的國民軍首都革命的通電，乃是半夜在民家土炕上寫成的。

在首都革命醞釀期間，息隱天津的段祺瑞，曾派袁良送一書親筆信給黃郭，有所策動。黃與段向少往來，安福系當國之際，黃郭在天津寓居寫作，未嘗入京。段的心腹大將徐樹錚及其參戰軍邊防軍中的將領，大都係黃的同學，也從未有所接觸。段氏此信來的實在有點突然，大概段氏急於倒直，時機稍縱即逝，故不能不出此一着。段函原文如次：

「膺白總長閣下：關心國事，景仰奚似。大樹（筆者按，大樹係指馮玉祥。東漢開國名將馮異受封爲大樹將軍，後人多借以指姓馮者。）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長，亦其短也。現在縱使深密，外人環伺，揣測無遺。驅之出豫，已顯示不能共事，猜忌待至今日始有也？當吳到京之時，起而捕之，減少殺害無數生命，大局爲之立定，

功在國家，誰能與之爭功也。現尙徘徊歧途，終將何以善其後也。余愛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

一、爆之於內，力省而功鉅。二、連合二、三兩路，成明白反對，恰合全國人民之心理。奉方不可不顧慮，即其他二、三處代爲周旋，亦無不可。宜早勿遲，遲則害不可言。執事洞明大局，因應有方，尙希一力善爲指導之。人民之幸亦國家之幸也。勿此佈臆，順頌時祉。餘由文欽（按，是袁良的別號）詳述。

名心勸。」

袁良面達的話：「從前用人不當，以後不擬再從政，有機會則周旋各派，報效民國。」此信寫得極露骨，黃郭接到很覺詫異，更想不到出自一個自命不凡的前輩。後來段復執政，則知政治之爲物，即老成亦不顧一切了，誠需要特別修養也。

驅逐溥儀一段由來

驅逐溥儀，整理文物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和黃郭，在紛亂萬端中，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那就是修改優待清室條件，迫使溥儀出宮。這件事本來應該是大快人心的，但却招致某些人的非議，而詎稱爲「逼宮」「盜寶」。其實馮黃此舉，完全是有法律根據，而且也是事實必要的。因爲在辛亥清帝退位時所定的八款「優待條件」中，第三款即載明：「清帝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民國三年所定「清皇室優待條件善後辦法」第三款，也載稱：「清皇室對於政府文書及其他履行公私權之文書契約，通行民國紀元，不適用舊時年號。……

：皇帝諭告及一切賞賜，但行於宗族家庭及屬下人等。其對官民贈給，以物品為限。所有賜證及其他榮典概行廢止。」可是溥儀對這些條件，始終并未遵守，一直住在宮裏，稱孤寡寡，「頒旨」、「賜證」、「賞騎馬乘輿、花翎、頂戴」，「三代誥封」等等，從來沒有停止過。而遜清遺老，眷戀故君，稱臣朝賀，一例如昔。形成了一個國家的首都裏，而有「帝廷」與「民國」兩個政府并存的怪現象。甚或以前受過清廷恩惠的民國大官，也有心懷舊主，歲時朝拜進貢，而「清廷」亦封賞如儀的怪事。乃至內外構煽，圖謀不軌，寢假而有民國六年的復辟醜劇之扮演，幾致動搖國本。

變亂收平之後，那種怪現象依然存在了七、八年之久，并未改革。就在首都革命前不久，尚有金梁、費樹楷等，給溥儀上了個秘密奏摺，請他「求賢才，收人心，聯友邦，不動聲色……心腹之臣密鑄於內，忠貞之士效命於外，成則國家蒙其利，不成則一二人任其害。……」如此這般的「密圖恢復，旋乾轉坤。」溥儀覽奏以後，竟封金、費二人為「少保」，以示獎勵。由此可知，溥儀久居內宮，實非國家之福。馮、黃為了清除隱患，不得不採取斷然處置。乃於十一月四日的閣議中，修正了「優待清室條件」。其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一條：大清宣統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第二條：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筆者按，辛亥清帝退位時，規定為每年四百萬元，但從未如數支付過）。……第三條：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

即日移出宮禁。」這個修正的優待條件通過後，為免拖延時間，發生煩擾，即令警備司令鹿鍾麟，警察廳張璧，會同國民代表李煜瀛立即執行。

因果之說老段無言

鹿鍾麟等於十一月五日率領必要人員，馳入宮內，通知清室，勸促溥儀即日搬出故宮，移居於什利河北河沿他生父的「醇親王府」，并派兵負責衛護。這一舉措，堪稱眼明手快，乾淨俐落，站在中華民國國民的立場，絕大多數的人自然贊同而稱幸。可是與清室有關的少數人，難免因利害關係，深致不滿。於是四出活動，由溥儀的老師陳寶琛、朱益藩和莊士頓（英國人）等，一面向東交民巷的外交團尋求「外援」，一面向平津一帶的舊勢力發動「勤王」。荷、英、日三國公使，曾向外交部提出「抗議」，作了個表面文章。而那些舊勢力的代表人物，却借故大譁，妄圖掀起風波。據說段祺瑞聞知此事，曾大罵馮黃二人不解事，他將公開反對。莊思謙由京到津，向段解釋，寫了兩個人的名字，密示段說：「煥章是這個人，膺白是這個人。」段看後連說：「前世因果」，怒氣漸消。有人研究這兩個名字，或猜袁崇煥，或猜黃道周，以之問莊，笑而不答。莊雖精研佛學，未必能洞察輪迴，指出前身，而且事出迷信，跡近荒誕。不過因段氏常與他研究佛學的關係，藉此以平段氏之氣，而消弭一時糾紛。後來馮玉祥到天津，段祺瑞面責他此舉不當，馮回答說：「此次到京，自愧未做一事，祇有驅逐溥儀，才真可以告慰天下後世的人，而無慚愧。」段聞言默然，而內心終不以為是。所以他到北京出任執政之次日（十一月廿四日），即命撤去護衛溥儀的軍警，使溥儀得以逃入日本使館，由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派兵秘密護送到天津日本租界，種下了八、九年後日本軍閥製造偽滿傀儡的惡因。以「三造共和」自炫的段祺瑞尚且如此，他人就可想而知。清室的「內務大臣」紹英、寶熙等，曾以「內務府」名義，致函內務部，說攝閣此舉是「強暴脅迫，清室不能認為有效。」

國父對驅溥案意見

後來 國父到了北京，他們還函請「主持公道，力踐前言。」國父當即函復：「條件須雙方遵守，自民元以後，清室帝號自娛，不遷居頤和園，屢違條件，至民六復辟，更有何條件之可言。」國父行轅秘書處也發表文件說：「……乃自建國以來，清室既始終未踐移宮之約。而於文書契券仍用宣統年號。對於官吏之頒給榮典賜諡等，亦復相沿弗改。是民國元年優待條件，及民國三年優待條件善後辦法中，清室應履行之各款已悉行破壞。而民國六年復辟之舉，乃實犯破壞國體之大旨。優待條件之效用，至是乃完全毀棄無餘，清室已無再請民國政府踐履優待條件之理。雖清室於復辟失敗後，自承斯舉為迫脅而成，斯言若信，則張勳乃清室之罪人。然張勳既死，清室又予以忠武之諡，實為獎勵崇奉，明示國人以張勳之大有造於清室，而復辟之舉，實為清室所樂從。事實俱在，均可覆按。綜斯數端，則

民國政府對於優待條件，勢難繼續履行。吾所以認十一月間攝政內閣之修改優待條件，及促請清室移宮之舉，按之情理法律，皆無可議。……開創民國的偉人，發出這樣義正詞嚴的議論，自然可起澄清的大作用。那些持反對態度和論調的人，雖然還不死心，可就鬧不起來了。我們現在拿歷史的眼光客觀評斷，民國政府對於一個退位多年的小皇帝，請其廢號出宮，手段雖然急了點，原則却是正確的。當時有人稱之為「逼宮」，已嫌比擬不倫，如果後來還有人跟着這樣說，就未免不可思議了。幸虧那時此一「逼」，否則的話，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閥侵入北平時，假使溥儀仍居深宮，豈不正好成為日閥利用的現成工具，那他偶象猶存，禍患必大。不幸當時「逼」的并不徹底，以致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把溥儀劫持到東北，作了偽「滿洲國」的「兒皇帝」，好在他聲望早受打擊，爲患也就不大了。溥儀三歲登基，幾起幾落，最後作了毛澤東的順民，以垂暮之年，過其牛馬不如的生活，亦云慘矣。

故宮文物整理經過

故宮所存的文物，乃是元、明、清三代所蒐藏，種類繁多，品質精美，是我中華文化數千遺留下來的無價寶。民國二年，北京政府把奉天、熱河兩行宮所存的古物，統通移運北京，陳列於文華、武英兩殿，集中貯存，更爲充實。但因爲沒有專設機構，妥爲保管整理，難免發生殘損。清室由於費用不足，常以「賜溥傑」（溥傑是

溥儀的弟弟）爲名，拿出去變賣。溥儀對於他的臣僚，又常有所頒贈。出入宮禁的特殊份子，也多順手牽羊，乘機竊取。以致故宮寶物，散失很多。以前的政府當局視若無睹，聽任國寶這樣流失，殊堪浩嘆。馮玉祥和黃郛深知文物的重要，乃即採取必要而有效的措施。於溥儀出宮之同時，即令鹿鍾麟等用事先準備好之國務院的封條，把宮內各處封閉。并派軍警多人，担任宮門守衛，嚴密防護。國務院緊跟着於十一月八日發表通電，說明修改優待清室條件及整理故宮文物之經過，原電云：

「慨自晚清遜政，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歸平等。曩年優待條件之訂，原所以酬謝遜清。然今時勢所趨，隱患潛伏，對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誠以北京爲政治之地，而宮禁又適居都會中心，今名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區，不能樹立國旗，依然用帝號，中外觀國之流，靡不引爲笑柄。且聞溥儀秉性聰明，平居恆言願爲民國一平民，不願爲禁宮一廢帝。蓋其感於新世潮流，時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爲虞。近自財庫空虛，支應不繼，竭蹶之痛，益傷其心。故當百政刷新之會，得兩方同意，以從事優待條件之修正。自移居後海後，并願由軍警妥密保護。從此五族一體，階級盡除，共和基礎，固如磐石。而在溥儀方面既得自由向學之機，復蘇作繭自縛之困，異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資格，宣勤民國。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緬維盡慮，定荷贊同。至於清室財物，業經令由國務院聘請公正紳耆，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共組一委員會，將所有物

件，分別公私，妥爲處置。其應歸公有者，擬一編號，分存於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中，俾垂久遠，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遜清之遺惠於無窮，恐遠道傳聞，有違事實，特電布聞，敬祈察照。」

同日，國務院明令組織善後委員會，辦理接收公產及整理保管事宜。原令云：「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業經公布施行。着國務院組織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私財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全部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之用。藉新文化，而垂久遠。」這個善後委員會，由李煜瀛負責主持，易培基、袁同禮等多人參加。經過將近一年的清點整理，大致就緒。十四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開放。從此巍峨宏麗的宮禁和精美瑰瑯的文物，遂公開展現於世人之前而放異彩，使我中華文化的傑構神品，傲視世界而爲人所欣賞推崇。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北平隨時有遭受戰火襲擊的危險，國民政府於廿一年令故宮博物院，選擇最重要的文物，南運貯存，以策安全。自民國廿一年秋開始裝箱，廿二年二月六日陸續起運，至五月十五日止，分批運至上海，計共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一箱。直待廿五年十一月，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庫房落成，即將這批存滬文物，全部運京保存。廿六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存京文物，開始向大後方疏散。一批經由湖南運存貴州安順，卅三年多因爲貴州軍事吃緊，再運四川巴縣。這批文物共八十箱，是最重要的精品，抗戰以前，曾運往英國倫敦展覽過。又一批四千零五十箱，及

代管北平古物陳列所等機關文物五千三百一十四箱，兩共九千三百六十九箱，由京裝船沿長江輾轉運存四川樂山。另外一批六千六百六十四箱，及代管北平古物陳列所等機關文物六百廿二箱。兩共七千三百八十六箱，由南京用火車運至陝西寶雞，再用汽車運至漢中、成都，最後運存四川峨嵋。除以上運到大後方者外，未及運出陷留南京者尚有二千七百七十箱。其他未南遷的文物，仍舊留存北平。抗戰勝利後，所有存川文物，一律集中重慶，然後沿江復員還都，陷京文物也全部收回。三十七年戡亂情勢惡化，政府急令將故宮博物院分院及中央博物院的文物，遷運台灣，計故宮博物院運出二千九百七十二箱，中央博物院運

出八百五十二箱，運到先存台中，四十六年三月再運台北。現在外雙溪博物院所陳列的，就是那一批運來運去完整無缺的國寶。大陸沉淪，文物遭劫，總算替國家保存了一些無法估價的寶物。身居自由地區的中國人，有眼福看到那些美妙結晶，除了情不自禁的欽仰我們祖先的偉大創作之外，自然要繼軌奮進，發奮創新，光復故物，再造中華。而對馮玉祥和黃郭當年不計毀譽，整理開放的大膽作爲，予以公平的評價。因爲首都革命以後不算短的一段時間中，有些偏見的人，造作蜚言，以清帝出宮爲有政治以外的作用，整理古物曾有掠奪的情弊，馮玉祥措了「逼宮」「盜寶」的惡名，易培基也因此吃過官司。



和馮玉祥聯合運用機勢反對吳佩孚的孫岳。

段祺瑞入京執政——等二次直奉

戰爭和首都革命，是由孫（國父）、段（祺瑞）、張（作霖）三角同盟演進而來的。江浙之戰和直奉之戰是三角同盟的直接產物。首都革命是馮（玉祥）、黃（郭）、胡（景翼）、孫（岳）等人運用機勢所發動。他們在醞釀期間，與段（祺瑞）、張（作霖）近在咫尺，故均有接觸。和廣東則因形格勢阻，似乎沒有直接連絡。所以曹（錕）、吳（佩孚）垮了以後，孫、段、張和段、張、馮兩個三角間的關係，頗爲複雜而微妙。

由於國父北上和國民黨人的積極活動，使得北方的革命風潮，

蓬勃澎湃，對於以後的革命進展，發生了無可估計影響。段、張、馮的三角聯盟却發生了大變化。據說段、張、馮三角在事先秘密接洽時，對於倒直以後的勢力劃分，曾經有所協議：（一）奉軍不得入關。（二）段祺瑞不得引用安福系舊人。（三）國民軍贊助各派在天津召集會議解決時局。但是直系崩潰之後，奉軍長驅入關，進逼平津，對於國民軍的乘勢擴張，怒目而視，亟思加以抑制。段祺瑞則在安福系舊人包圍之下，力謀入京問政。馮玉祥等於十月廿七日推舉段祺瑞爲國民軍大元帥，段於二十九日通電響應馮玉祥。張作霖盧永祥等，也於十一月卅日，聯名通電推舉段爲聯軍統帥。就這一連串的發展看來，與原協議完全不符，究竟是他們不遵守協議，抑或根本就沒有那一協議，則成了一個無法證實的謎。

黃郭的攝政內閣，於十一月七日任命胡景翼爲河南督軍，孫岳爲河南省長。胡孫二人即率國民二、三兩軍，沿京漢鐵路南下，虎踞中原，逼臨西北，監視東南。有關各省的當局，面對這個首都革命及其引發的新形勢，不能不作適應的打算。十三年十一月十日，蘇、浙、鄂、皖、贛、閩、豫、陝及海軍的重要人物（川、湘兩省亦有代表參加），在南京舉行會議，謀商對策。十三日，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周蔭人、杜錫珪、馬聯甲、蔡成勛、劉鎮華、李濟臣、李炳之等聯名通電，否認北京政府所發命令，并推請段祺瑞出山。

同時也顯示出以聯防的姿態，和奉系及國民軍對峙，反對他們的勢力南下。